

東方叢刊

2009.2

- 中华美学学会
 -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
 -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 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
 -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联合主办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收录期刊

主编 麦永雄

东方文化 / 东方美学 / 东方文论 / 东方文学 / 比较诗学 / 比较文学

D o n g f a n g C o n g k a n

东方丛刊

季羡林题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收录期刊

2009.2

中华美学学会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联合主办

主编 麦永雄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丛刊. 2009年. 第2辑 / 麦永雄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5633-8544-7

I. 东… II. 麦… III. 文学研究—中国—丛刊
IV. I20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98587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金山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开本: 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8.5 字数: 210千字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1~750册 定价: 1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东方丛刊》

顾问

特约编委

编委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季羨林 贺祥麟

丁 帆 王 杰

叶 朗 乐黛云

刘纲纪 刘中树

朱立元 吴元迈

饶芑子 郭齐勇

钱中文 黄宝生

童庆炳 曹顺庆

董晓萍 曾繁仁

王德明 孙建元

麦永雄 张明非

张利群 肖启明

何林夏 胡大雷

莫其逊 黄伟林

覃德清 雷 锐

目 录

比较文学与诗学

杨中举	呼愁:帕慕克小说创作的文化诗学风格	(1)
林精华	东正教之于中国:一种声音微弱的正面诉求	(15)
侯传文	中印文化哲学:泰戈尔与道家	(32)
尹锡南	印度作家维克拉姆·赛特笔下的中国题材	(46)
苏 敏	言志:从中西文学视域论中国诗学体系的诠释原则	(61)
张 源	高度归化的《学衡》译本与白璧德“儒者”形象的生成	(82)
史 阳	菲律宾阿拉安—芒扬人洪水神话的象征内涵 ...	(95)

文本·叙事·美学

王小岩	窦娥之死:文本间的“讲述”	(110)
祝亚峰	叙事伦理:小说叙事研究的现代形态	(129)
潘道正	圣像之争:冲突与融合中的审丑问题	(144)
陈友峰	论美育对“人”的作用及其在当今社会的价值和意义	(156)

古典探賵

张开焱	楚国帛书创世神话产生的时代问题	(169)
[韩]朴贞淑	《文选》东传时间及其途径	(185)
周苇风	《周易·大畜》卦“利艰贞”、“曰闲舆卫”辨正 ...	(203)
李丽琴	论经学信仰与韩愈“文以明道”的文学阐释观念的提出	(215)
于俊利 傅绍良	从唐代祭文看骈文的演进	(229)
甘松 刘尊明	宋代宫廷词的文化内涵及词史意义	(238)

东方文库

周纪文	和谐美学的新发展与本质超越	(255)
何水英	别开生面谈方法——轻松活泼话文学 ——评詹福瑞《不求甚解——读民国古代文学研究 十八篇》	(266)

呼愁：帕慕克小说创作的文化诗学风格

◎ 杨中举

“呼愁”是帕慕克小说创作的重要文化诗学风格。它呈现为帕慕克个人的精神、文化、艺术气质，表现为伊斯坦布尔的城市文化品格和土耳其民族集体的文化忧伤。“呼愁”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历史文化的结晶，是东西方文化冲突与混杂的必然后果。帕慕克所有的小说都表现出这种“呼愁”，并对这种“呼愁”进行了社会历史文化的剖析，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与文学审美意义。

一、“呼愁”小释

什么是“呼愁”？它与“忧愁”、“忧郁”、“忧伤”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帕慕克总是用“呼愁”一词表达他的文化思想感受？在2003年发表的自传性作品《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帕慕克对“呼愁”进行了细致的说明，探讨了它的多层意义与历史演变。

第一层，在土耳其历史文化、宗教、哲学传统语境中，“呼愁”

(hüzün)一词是土耳其语“忧伤”之意,原指失落及伴随而来的心痛与悲伤。它根源于阿拉伯伊斯兰教,在《古兰经》中两次写作“huzn”,三次写作“hazen”,当年穆罕默德的妻子哈蒂洁和伯父塔里涌去世,穆罕默德把那年就称作“Senetül hüzn”,也就是“忧伤之年”^①。帕慕克还认为在伊斯兰的历史中,“呼愁”呈现为哲学意义上的两个传统,第一个是世俗享乐和物质利益追求过多时所体验到的呼愁,因为伊斯兰教主张真正的教徒不应过多在意人世间的得失^②。另一个传统来自苏菲神秘主义思想,是指“不够靠近真主阿拉,因为在这个世上为阿拉做的事不够而感受到的精神苦闷”,“由于与真主阿拉永远不够接近、对阿拉领悟得永远不够深刻,使人倍感哀痛、空虚、欠缺”^③。在苏菲派的思想中,“呼愁”具有了一种光荣的色彩,深受推崇。这两个传统影响了土耳其文化与历史,特别是伊斯坦布尔城的历史文化,“呼愁”成为这个城市生活的核心之一,成为土耳其诗歌的基调之一。而在帕慕克看来,这一强烈的“呼愁”感,与奥斯曼帝国毁灭的历史密切相关,这一历史映射在伊斯坦布尔的城市风景及人群身上,形成了土耳其人共同的思想状态:“伊斯坦布尔的呼愁不仅是由音乐和诗歌唤起的情绪,也是一种看待我们生命的方式,不仅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一种思想状态,最后既肯定亦否定人生。”^④

第二层,是医学、心理学与哲学意义上的“呼愁”,涉及生理、心理、精神文化方面,在这个层面上帕慕克探索了这个词的起源。伊斯兰医学家、思想家金迪(El Kindi)、医师哲学家阿维森纳(Ibn Sina)等把“呼愁”看做一种疾病,死去亲人的痛苦,还有各种精神磨难;医学家伯顿在其作品《忧郁的解剖》中把它称为“黑色痛苦”,将对死的恐惧、爱、失败、恶行与各种食物列在一起,寻找治疗方法,从而使医学与哲学进一步结合,孤独和忧伤成为伯顿关注的重点。从这些人的观点出发,帕慕克得出结论认为:“呼愁”起源于和忧伤一

样的“黑色激情”，根源于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已发现的基本体液——黑胆汁，并指通常与这种感觉联系在一起的脸色及其暗示的滞塞之苦^⑤。帕慕克所说的黑色激情，就是古希腊词语“melancholia”——黑胆汁，词根 melan 意为“黑色的”，kholi 意为“胆汁”——作为一种疾病是指是因黑胆汁过多而引起的，以精神郁闷、低沉及怒气猛烈爆发为特征的一种精神状态。后演化为英语中的“melancholy”一词，为“忧郁，悲哀或情绪低落，郁闷，沉思”之意。

第三层，是西方旅行者和作家视角下伊斯坦布尔的城市忧伤。这些西方人视角对后来的土耳其诗人、作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奥斯曼帝国时期，在西方人眼里君士坦丁堡（后来的伊斯坦布尔）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与浪漫情调的地方，比如，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时代，法国的骑士传奇和回忆录就多次写到君士坦丁堡，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维尔阿杜安在 1212 年完成的回忆录《君士坦丁堡征服记》（1657 年出版），记述了十字军攻克君士坦丁堡的过程。1697 年，路易十四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费里奥尔先生，曾把高加索地区的一个姑娘带回法国，作家普雷沃神父（1697—1763）据此写出了富有浪漫色彩的小说《一个现代希腊姑娘的故事》（1740）。至 19 世纪，欧洲作家，特别是法国浪漫派作家纷纷踏上了东方之旅，寻找异域世界的情调，不少人在伊斯坦布尔留下了足迹。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列举数位法国作家，探寻西方人眼中的伊斯坦布尔。法国作家、诗人奈瓦尔^⑥带着疗养的目的来到伊斯坦布尔，以赞扬的态度表达了他的所见所感。1841 年奈瓦尔 33 岁时，单恋着法国著名演员热妮·珂伦，珂伦病逝后，奈瓦尔人财两空，患上了忧郁病。为了治疗，他开始了东方之行。1843 年，奈瓦尔来到伊斯坦布尔，热衷于寻找帮助他忘记忧伤的事物。而他到达时恰逢伊斯兰斋月期间，享受了节日间的皮影戏、灯火辉煌的城市夜景、苏菲旋转舞……他对伊斯坦布尔的回忆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

带上了他的想象色彩：“伊斯坦布尔有着全世界最美丽的景致，它就像剧院，从观众席观赏最美，避开了舞台侧面贫困肮脏的街区。”^⑦ 1850年10月，作家福楼拜来到伊斯坦布尔时，则发现“伊斯坦布尔不是他要寻找的东方”，他在贝鲁特患上的性病令他苦恼不已，肮脏的妓院、阴沉的墓园成为他的兴趣所在^⑧。1852年，法国诗人戈蒂耶^⑨到伊斯坦布尔旅行时，则发现了城里的某些景色“忧伤之极”，“在脏乱之中发现了忧伤之美”^⑩。他孤独地行走在城市的小巷里，身后跟着咆哮的狗群。他看到的是未经粉刷、颜色发黑、东倒西歪的木造房屋，年久失修的残破喷泉，屋顶塌陷的陵墓，留意到破旧黝黑的房屋、石墙、空巷以及墓园不可缺少的柏树。他还真实地描绘了从偏远的贫民区穿过的拜占庭废墟，详尽地表述了城墙的破败与裂痕，破碎的残片，枯燥沉闷的环境，以至于对这一幕幕“忧伤之极”的景象发出感叹：“殊难相信，这些死寂的城墙后头存在着活生生的城市！”“我相信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比这条路更严峻、更忧伤，路长三里多，一端是废墟，另一端是墓地。”^⑪帕慕克在戈蒂耶这里找到了“呼愁”的共鸣，从1850年到今天，一百五十多年了，伊斯坦布尔的“忧伤”、“呼愁”由西方人发现，至今已经沉淀成形：“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间，我肯定‘呼愁’不仅统治着伊斯坦布尔，而且已扩及周围地区。我一直想说明的是，我们的‘呼愁’根基于欧洲；此概念首先以法语（由戈蒂耶而起，在朋友奈瓦尔的影响下）探索、表达并入诗。”^⑫

第四层，土耳其本土作家视角下的“呼愁”。帕慕克考察了起源于西方的“呼愁”之后，同时考察了“呼愁”在土耳其作家、学者身上的表现，他们置身于土耳其文化当中，与西方作家的感受有明显不同。帕慕克列举了四位有代表性的孤独忧伤的作家：诗人雅哈亚、历史学家科丘、小说家坦皮纳、记事散文家希萨尔。从他们的作品中，帕慕克清楚地认识到“呼愁”是“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灵魂”。四位作家都是处于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关系中的人，都深受东、

西方两种文化的影响,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把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融合在一起。诗人雅哈亚深受法国文学影响,从马拉美和魏尔伦那里引入“纯诗”的概念,用于自己的民族主义诗学。小说家坦皮纳从戈蒂耶那里学习到了描绘风光的手法,他描述伊斯坦布尔的长篇小说《和平》中充满“呼愁”,它使主人公们的一切走向失败:“充塞于风光、街道与胜景的‘呼愁’已渗入主人公心中,击垮了他的意志。”^⑧布萨尔则学习小说家纪德。历史学者科丘则是一个充满“呼愁”情感的人,“呼愁定义了他的生命”^⑨,他把忧伤看作与生俱来的东西。他们正是这样遭遇了学习西方与保持自己的原汁原味风格之间的矛盾、苦恼,他们还要面对国内政治局面的影响、限制,处于两难境地。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找到自己要表现的主题?帕慕克认为,他们找到的共同主题是奥斯曼帝国文明衰退的历史。这一衰落的历史在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中表现出来,描绘伊斯坦布尔的过去、废墟、往日之美的失落就可以找到“自己真正的声音”^⑩。他们回顾城市昔日的光辉,关注衰败之美,赋予过去以灿烂的诗意,同时又不得不面对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不同政治主张、不同宗教信仰的影响,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们可以拥抱城市的忧伤以分享社群精神,同时透过西方人的眼光看待伊斯坦布尔,以求表达这种群体忧伤、这种‘呼愁’,显示这座城市的诗情。违反社会和国家的旨意,当人们要求‘西方’时他们‘东方’,当人们期待‘东方’时他们‘西方’——这些举止或许出自本能,但他们打开了一个空间,给予他们梦寐以求的自我保护孤独。”^⑪在这些作家身上,“呼愁”已成为一种个体的精神风格与艺术风格。

帕慕克的“呼愁”风格与这四个层面有着密切的历史继承关系。

二、帕慕克的“呼愁”及根源

帕慕克的“呼愁”是其小说创作中重要的文化诗学风格,也是伊斯坦布尔的城市文化品格,还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文化积淀,更是东西方文化冲突、混合杂交过程中形成的土耳其民族的文化个性之一。

在帕慕克看来,他个人的和整个土耳其的“呼愁”均源于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和奥斯曼帝国衰落史:“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⑧帕慕克从小没有离开过伊斯坦布尔,他依附于这个城市,这个城市造就了他,从小呼愁就笼罩着他,笼罩着整个城市:“我的起点是一个小孩透过布满水汽的窗户看外面所感受的情绪。现在我们逐渐明白,‘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我想说明的是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的‘呼愁’。”^⑨在他的作品中,“呼愁”的本质就是伊斯坦布尔城市本身,它的历史、旧照片、风景画,行走其中的父亲们,玩耍其中的孩子们,蒙面妇女、皮条客、理发师、老书商,20世纪50年代的雪弗兰汽车、排水槽、墓地、破天桥、老街区……一至三流歌手、只会说“YES”和“NO”的学生、移民、候鸟,能够在这座城市所见的一切都弥漫着“呼愁”。帕慕克说:“看见‘呼愁’,并对表现在城市街头、景色、人民身上的种种形态表达敬意,于是我们处处察觉到它:隆冬之晨,当阳光忽然照耀博斯普鲁斯海,微微的水雾从海面升起时,你几乎触摸得到深沉的‘呼愁’,几乎看得见它像一层薄膜覆盖着居民与景观。”^⑩但是这里的“呼愁”与前面所述作家、学者、思想家的忧愁

不同,也不同于法国学者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描述的忧郁,斯特劳斯以西方人的眼光观察热带的贫困大城市所产生的忧郁,是旁观者感受到的忧郁,不同的是,伊斯坦布尔具有辉煌的历史与文明史,这种文明的遗迹处处可见,与伊斯坦布尔人朝夕相处,生活于其中的人就是“呼愁”的组成部分,他们是当事人而不是旁观者,因而帕慕克说“呼愁”不是旁观者的感觉,而是伊斯坦布尔城市及其人民“自愿承载的‘呼愁’”,它与他们“倍感荣幸地承担其‘呼愁’”^⑨。帕慕克本人的生活与创作同样承载着这种“呼愁”,他害怕这种愁绪,又迷恋它:“我慢慢懂得,我爱伊斯坦布尔,在于她的废墟,她的‘呼愁’,她曾经拥有而后失去的荣耀。”^⑩可见,“呼愁”是伊斯坦布尔城市的文化性格,而这座城市及其无孔不入的“呼愁”已成为帕慕克生活与创作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前文已述,“呼愁”一词源于西方,但是,帕慕克的“呼愁”、伊斯坦布尔和整个土耳其的“呼愁”则有着自己产生的独特地理、历史与文化空间。从根本上说,它产生于东西方文化冲突与交融混杂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土耳其,特别是伊斯坦布尔横跨东西方的地理与文化空间,使其天然具有历史文化生成作用,伊斯坦布尔曾经是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首都,有着辉煌的历史,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到处是帝国遗迹与废墟,对现当代土耳其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仍然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1280年兴起的奥斯曼帝国让保守的土耳其人怀有深刻的历史自豪感。但是这样一个帝国自从兴起之时就包含了多种民族与文化问题:“奥斯曼历史是错综复杂的。它不但涉及奥斯曼王朝本身,而且还涉及在该帝国统治活动及扮演统治者角色的许多人,并涉及许多被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民族,诸如突厥人、阿拉伯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保加利亚人、匈牙利人、阿尔巴尼亚人等等。在臣民、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中形成了重要的宗教团体,它们的历史构成了奥斯

曼历史的一部分……”^②同时,奥斯曼帝国五六百年的历史也是一部同欧洲文化冲突的历史,二者之间的战争从没间断过,1683年奥斯曼军队攻打维也纳的失败,标志着帝国由盛到衰的转折,并最终导致了帝国的灭亡。也正是从帝国的失败开始,土耳其陷入了西化与本土化的历史文化冲突的潮流,此后数百年这一问题困扰着土耳其民族。

帕慕克对这一历史状况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伊斯坦布尔在地理上是个混合之地,土耳其国家也是。百分之六十的人保守,百分之四十的人寻求西化。两股力量争论了不下200年。这种处于东方、西方之间的林勃悬置状态,就是土耳其的生活风貌。”^③以伊斯坦布尔为主的地区,处于欧亚大陆交汇处,著名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把两个大陆既分开又相接,这注定了它处于伊斯兰文明与欧洲文明碰撞、交流的前沿,可以说一部土耳其历史就是东西方不同文化交锋的历史。几百年来,如何处理两种不同文明的关系一直是土耳其政治家、历史学家、文学艺术家关心的问题。帕慕克虽然宣称自己不热衷于政治,但是他的作品大部分还是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土耳其来说,西化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与其说是斗争还不如说是一种生活风尚。土耳其二百年前就决定走西化之路,至今仍在途中。国家的大多数斗争都围绕这个问题。”^④可以说,帕慕克是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与混合的社会风潮中成长起来的,他从小目睹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社会变化,生活于伊斯坦布尔充满历史文化“呼愁”的环境中,学习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由盛到衰的历史及其给它的人民带来的精神影响。这样,帕慕克从创作伊始就自觉不自觉地关心着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他自己所言:“我所有的小说都是关于东西方之间隔阂与融通的作品。”^⑤直至今日,土耳其仍然具有这种鲜明的两面性: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伊斯兰教与世俗主义之间存在着—道巨大而无形

的墙，这堵墙在历史文化冲突中垒起：“通常，你要看得出你究竟站在东方还是西方，只需看你如何提起某些历史事件。对西方人来说，1453年5月29日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东方人来说则是伊斯坦布尔的征服。”^⑧因为在这一年这一天奥斯曼皇帝穆罕默德二世攻占了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⑨。这对土耳其人来说无疑是历史性的胜利，对西方人来说则是历史性的失败。正是因为这样，面对辉煌的历史和当今发达的西方文化，土耳其人普遍产生了失落感、挫败感，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也才显得非常困难。主张西化的人和保守的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政治、宗教、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冲突不断。这种社会氛围加重了伊斯坦布尔城市的“呼愁”感，也影响了人们的思想精神与生活状态，结果“土耳其现代化、繁荣、西化的梦想因而更难达到”^⑩。而对于保守的人来说，西方的快速发展与土耳其自身的落后又让他们深感不安与忧伤，甚至愤怒。无论主张西化的人还是保守的人，他们深知贫穷杂乱的伊斯坦布尔不可能再达到与往昔同样伟大的文化高峰，于是产生忧伤情感——“呼愁”。这是一种由知识分子个人的感觉发展到土耳其民族集体的忧伤感觉，它已不是某一孤独者的忧伤，而是千百万人心中共有的忧郁情结。

三、“呼愁”弥漫的小说风格

“呼愁”是帕慕克在文化的意义上对土耳其历史和当代现实的艺术反映、艺术发现和社会文化剖析。从处女作《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1979)到最新的《纯真博物馆》(2008)都或浓或淡地呈现着这一风格特色。《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以帕慕克生活成长的伊斯坦布尔尼尚塔石区为背景，写了一个富有的伊斯坦布尔

家庭三代人的故事。三代人的历史命运表现了部分土耳其人逐渐被财富俘获、被西方文化所浸染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到帕慕克家庭的影子,具有明显的自传性。帕慕克说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个家庭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家庭的故事”^⑧。小说故事从1905年始,一直到1970结束,时间跨度较大,其中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巷尾、家庭氛围、人物性格气质都隐现着一股来自历史与现实的“呼愁”。帕慕克1983年出版的第二本小说《寂静的房子》(Sessiz Ev),运用西方现代主义内心独白式的意识流手法,以五个人物视角——法鲁克、麦廷、祖母法蒂玛、侏儒侍者塞吉普、侍者的侄子哈桑——对往事进行了回忆。小说的地点移到了海滨小城盖布泽一个叫天堂堡垒的地方,时间也移到了20世纪80年代。盖布泽虽然不是伊斯坦布尔,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祖孙三代人的叙述中,感受到因政治立场、宗教信仰不同和文化冲突所带来的无法言表的“呼愁”感。盖布泽的街道、商店、房子、历史、现实与未来和伊斯坦布尔没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呼愁”弥漫,“寂静的房子”不寂静,人们在这里无法摆脱社会、历史、文化冲突带来的愁绪。

历史小说《白色城堡》(1985)以17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为背景,探索“呼愁”产生的根源——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历史。这一历史时期是土耳其帝国由盛转衰的关键时刻,1520—1566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苏丹(Sultan)苏雷曼(Suleman)的领导下,文治武功达最盛期,欧、亚、非、地中海、红海、印度洋皆在其管辖区。同时种种迹象也表明这时的土耳其开始走下坡路了,如1529年,土耳其人曾经打到奥地利维也纳城门下,但攻城不克而返。小说叙事时间就是以这段历史为背景的。“白色城堡”是西方文化的象征,也是土耳其帝国由盛转衰的起点。从此帝国的发展一直落后于西方,成为土耳其历史与文化之殇,也成为“呼愁”产生的历史根源。

《黑书》(1990)以伊斯坦布尔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年轻律师卡利普在妻子失踪后的故事:卡利普的妻子如梦与同父异母的弟弟耶拉私奔,但是卡利普无法找到他们的行踪。耶拉是著名的新闻记者,写出了不少出色的专栏文章,卡利普一直是他的崇拜者,经常阅读耶拉的文章,他想根据文章中透露出的线索寻找如梦的行踪。他推断他们二人可能住在一座叫“城市中心”的公寓中。然而他发现那里早被遗弃,于是自己搬了进去。渐渐地卡利普代替了耶拉的角色,开始写专栏文章,但他必须读耶拉的文章,否则他就无法工作。一天夜里,当他回到公寓时,听说耶拉被杀,如梦也死了。小说写到这里就结束了。同《白色城堡》一样,文化身份问题仍是小说探索的主旨之一。小说中的人物都努力想成为“他人”。相比之下,这部小说中的“呼愁”感更强了。如梦抽烟的习惯,卡利普寻找如梦的过程,假想中将要干涸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刽子手的梦境,卡夫山中的文字,经常出现的雪景,耶拉公寓邻近的黑暗楼洞,尼尚塔石广场,耶拉的失踪被杀之谜,王子的命运等,都充满强烈的呼愁感。马悦然先生也在《帕慕克的小说〈黑书〉》一文中指明:“书中的黑暗与雪景加强了伊斯坦布尔的‘呼愁感’。”^③

1995年发表的小说《新人生》,以一本流行于青年中的名为《新人生》的书作为西方文化的象征,它在土耳其的传播引发了从城市到乡村的文化冲突带来的“呼愁”。在小说中,我们看到城市广场上展示着土耳其现代化代表卡莫尔·阿塔特克的雕像,同时人们对古老的伊斯兰价值观有着热情,也对消费社会的诱惑有着热爱,二者形成一种撕扯争夺状态。这种文化冲突产生的“呼愁感”自然不可避免。

《我的名字叫红》(1998)以16世纪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为背景,围绕土耳其苏丹宫廷细密画师高雅被杀事件,分五十九个叙述单元,讲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故事。59个叙述者,甚至包括凶手的